

我亲历改革中的 中国地质工作

寿嘉华 著



地质出版社

我亲历改革中的 中国地质工作

寿嘉年华 著

地质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亲历改革中的中国地质工作 / 寿嘉华著. - 北京：
地质出版社，2008.6

ISBN 978-7-116-05701-2

I. 我… II. 寿… III. 地质－工作－概况－中国
IV.P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7499 号

WO QINLI GAIGEZHONGDE ZHONGGUO DIZHIGONGZUO

责任编辑：李 帮

责任校对：李 攻 关风云

出版发行：地质出版社

社址邮编：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100083

电 话：(010) 82324508 (邮购部); (010) 82324501 (编辑室)

网 址：<http://www.gph.com.cn>

电子邮箱：zbs@gph.com.cn

传 真：(010) 82310759

印 刷：北京地大彩印厂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 张：19.7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书 号：ISBN 978-7-116-05701-2

(如对本书有建议或意见敬请致电本社；如本书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我亲历改革中的中国地质工作》是寿嘉华同志对自己从事地质工作的一次系统的回顾，也是她对自己从事地质工作数十年来的一次总结。她把自己对中国地质事业的深厚情感，通过本书全面地展示了出来。

嘉华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从事地质工作，为地质事业奉献了宝贵年华，并与地质战线上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96年被任命为地质矿产部副部长，1998年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2001年起兼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曾先后被推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全国妇联八届、九届执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国地质事业中的一位女部长，不愧为地质巾帼。

地质工作是一个必须了解野外地质情况的特殊行业。嘉华同志把到野外地质队实地考察、调研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全国九百多个地勘单位她跑遍了其中的七百多个。她为加强海洋基础地质调查、加强1:5万矿产资源调查全力呼吁，上下做工作，使一系列专项调查项目得以落实；她为健全完善中国地质调查局、组建中国地质队伍“野战军”做

出了不懈的努力，将中国地质调查局建设成为国家层面的地质工作机构，使其在规格和职能上与国家地质工作相匹配，在中国地质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努力和奉献。

嘉华同志在领导地质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央领导提出的“地质工作，既是经济建设的先行，又贯穿于长期建设的全过程，渗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一指导方针，用实际行动响应中央为“三农”服务的指示精神，创新性地组织实施农业地质调查（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并且在西部找水、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为全民共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同时，根据地质工作走向全球化这一特征，在国家地矿政策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嘉华同志不畏困难，锐意进取，坚持为“请进来、走出去”、建立一个开放的矿业市场积极努力，开拓了地质工作国际合作新领域、新模式。

现在，嘉华同志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她满怀热情地将自己从事中国地质事业的经历写出来，让我们从中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历程，感受到祖国河山的可爱，同时也感受到中国地质工作者的可敬。相信更多的热衷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同志们，为做好工作，会从这本书中得到启发。

邹嘉华 2008年
3月2日

目 次 | CONTENTS

序

我的地质情结 1

《旅行家》杂志让我走上了地质之路 2

大学生涯使我坚定要做“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 6

社会大熔炉教会了我如何对待人生 17

一首歌与我献身地质事业的誓言 22

九年扶贫情深意长 29

当好母校的“后勤部长” 44

绵绵不断地质情 49

我接触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51

朱镕基同志的亲切随和 53

温家宝同志的敬贤亲民 58

邹家华同志的地质情怀 74

曾培炎同志的严谨作风 83

我经历的地质工作改革 91

中国地质工作回顾 93

基地建设 清产核资	98
争取财政支持 开拓信贷	116
产业结构调整	121
队伍体制改革	136
第三届全国地层会议	144
地质队伍“野战军”的组建	154
我对地质工作方针的思考与实践	175
青藏高原区调：提速、提速、再提速	177
加快地质工作信息化	189
地质调查挺进蓝色国土	196
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西南三江找矿”和“罗布泊钾盐”	209
打造“民心工程”	228
坚持以人为本	242
开拓农业地质调查新领域	252
推进中国矿业全球化	266
我心中的地质之歌	279
《地质之歌丛书》暨地质工作纪念邮集出版座谈会	280
“心连心”活动唱响“地质之歌”	291
结语	295
奉献者无尚光荣	296
后记	297

我的地质情结

高中时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受到一位同学的启示，得知地质工作可以满足我走遍祖国山山水水的愿望，因而在懵懵懂懂之中，便对地质产生了兴趣。在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便鬼使神差似的在八个志愿栏里全部都填写了“北京地质学院”，并如愿以偿，从此与地质结下了不解之缘，走过了整整四十多年的地质之路。

在这四十多年的地质生涯之中，我经历了中国地质的风风雨雨，亲历了中国地质工作的几次重大转变，也见证了转型时期中国地质体制改革。当然更多的，还是我与千万地质工作者一起，共同走过了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地质工作历程。而在我的心里，也因此结下了一份浓浓的、永远都无法抹去的地质之情。



《旅行家》杂志 让我走上了地质之路

很多人都感到奇怪，像我这样一个外表娇小的女性，怎么会一生跟地质结下不解之缘？其实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原因非常简单。那时，有一本《旅行家》杂志，我经常看。虽说我是温州长大，从来就没有迈出这座小城半步，但这本杂志让我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我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杂志中的那些人物一样，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这本杂志，成了我步入地质事业最初的渊源。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地区，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历代名人辈出，是浙南政治、文化、经济、交通、旅游中心。这座著名的江南小城，不仅山清水秀，更因为较早就步入市场经济而声威大震。温州生意人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温州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

1943年11月7日，我出生在这座著名的江南小城。不过，我父亲是浙江湖州安吉人，母亲是宁波人。再往前追溯，我的祖先生活在浙江诸暨的寿村。我曾经为了完成已经93岁高龄的父亲的愿望，请人专门查过我们这个寿氏家族的情况，结果找到了一本很有年头的“寿氏宗谱”。上面写得很清楚，我们寿姓起源于春秋时期，出自姬姓：“周太王子仲雍的曾孙名周章，居于吴，周武王克商以后，遂封其地，建立吴国，为周朝附庸。周章十四世孙寿梦主吴时，国势强大，



称吴王，为诸侯国，与各国争抗，故春秋时吴国自寿梦始。寿梦的支庶子孙，有的以祖先名字为姓，形成寿姓。”这段记录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我们寿姓的起源。同时我也了解到，我的祖先是河南中原地区的，在一千多年前从河南迁徙到浙江诸暨。之后，寿氏家族便在诸暨和绍兴一带繁衍生息。当了解了我的祖先们的情况时，我发现全中国所有姓“寿”的祖籍都在诸暨一带。姓“寿”的人不是很多，所以要真是遇到一个同姓的人就跟一家人似的。有一次，我陪刘源中将到我们的地质博物馆参观。听说我姓“寿”，他当即就很兴奋地打了一个电话，并说介绍一个和我同姓的人给我认识。不一会，一位叫寿晓松的军事科学院的少将就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大家一见面都很高兴，如遇家人。他也是浙江诸暨人，真正是应了那句话“五百年前是一家。”

我家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大。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新中国成立前是小学老师，新中国成立后在幼儿园工作，从事儿童教育。也许是家庭的影响，小时候，我比较爱学习，对枯燥乏味的数学课非常喜欢。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在一次全市数学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二名，并因此被保送到温州一中上高中。温州一中曾经培养出像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那样的知名人士，能到这所中学上学让我欣喜若狂，我希望通过努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科学家。

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在温州读书。每天就是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两点一线，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书呆子。我母亲曾经回忆我小时候的一些趣事。有一次，她让我外出买酱油，过了半天，酱油没买回来，我反而把钱弄丢了。所以，在温州的学生时代，我基本上就是一个足不出户的单纯的小女生。我父亲是一位做事有毅力、思考问题有韬略的人。父



亲虽然没有受过很正规的医学教育，但是他肯钻研，通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出一套气功按摩疗法，治好了很多慢性病人。有一位患了严重胃下垂的患者，医院里都没法治了，他打听到我父亲有一手绝活便找上门来，我父亲把他的病治愈了。几年后，这个人移居匈牙利，至今回国必来看望我父亲。父亲当过牙医，那时开药方一般都需要用拉丁文，我父亲就自学拉丁文。后来退休了，年纪大了，他又开始学几句英文，还出了一本气功按摩的书。



▲ 2000年，作者与父亲寿如松（前排右）、母亲厉兰香（前排左）及大弟寿嘉林（后排右二）、二弟寿嘉权（后排左二）、三弟寿嘉定（后排右一）、小弟寿嘉庆（后排左一）合影

高中毕业时，由于家中兄弟姐妹多，我又是老大，父亲希望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减轻家中负担。就是考大学，他也希望我能报考医学院。但是，《旅行家》杂志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从这本杂志上，我知道除了我美丽的家乡温州外，偌大的中国还有许多美丽的地方：碧波万顷的大海、萦绕在重峦叠嶂间的云雾、漫山遍野的奇花异草……我的愿望就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可什么职业才能满足我的这个心愿呢？一位同学告诉我：要想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就去搞地质。一听这话，我如获至宝，因为这正好与我的愿望不谋而合。于是，我瞒着父亲填了高考志愿，并且所填的八个志愿全是“北京地质学院”。最后，我如愿以偿。

那一年，是1960年，我16周岁。尽管当初报考北京地质学院的想法很朴素，也很简单，更不是什么远大的理想，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愿望，让我无怨无悔地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地质之路。



大学生涯使我坚定要做 “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

五年的大学生活，不仅让我学到了非常丰富扎实的地质知识，为我今后的地质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让我学到了宝贵的做人的道理，是我人生的一次升华。在这五年里，我与地质工作的情结从一个朴素的愿望上升到了真诚的爱，上升到了一种高尚无私的情怀，“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这一荣誉称号，在我的心里扎下了牢固而又永久的地质之根，《勘探队之歌》激荡起了我对地质工作无法磨灭的深厚感情。正是这五年，我的人生与地质融在了一起，永难分离。

能够被北京地质学院录取，我非常开心。在此之前，一直都没有踏出过温州一步。像许多人一样，《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的欢快旋律，以及“天安门上太阳升”的壮丽景象，一直都让我对伟大首都北京和北京天安门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想到就要看到北京天安门那神圣的光彩，我的心情真的是无比激动。

由于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太好，我是与同学一起坐火车前往北京到学校报到的。到北京站下了火车，便看见很多大学都打着横幅在出站口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北京地质学院的横幅非常醒目，很容易就看到了，没费什么周折，就坐上了北京地质学院迎接新生的车子。巧得很，从火车站



到学校正好要经过天安门，这让我好激动，因为我没想到自己到北京的第一天就能见到梦想中的天安门，因而一路之上情绪非常高涨。快到天安门的时候，接我们的老生就提前告诉我们：“快到天安门了，大家注意看。”我听了，立刻就不顾一切地扒着窗户向外看。那种渴望的心情，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我终于看到天安门了！那一片红墙碧瓦，飞檐斗拱，看上去，真的让人热血沸腾。尤其是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天安门，那种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司机师傅还特意将车速放慢了。我当时就想：我终于到北京了，终于看到天安门了，我一定要在天安门前照张照片寄回家里，让父母看到我站在天安门前的风采，那该是多么荣耀的事情！于是，这也成了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愿望，而实现这个愿望，是在入学后一个多月，10月底的时候。



▲ 1960年10月底，作者在天安门前留影



那时候北京的10月尽管阳光明媚，却已经非常冷了。我扎着一对小辫子，穿着一件花棉袄，准备前往天安门。当时家里没有钱给我，我靠的就是国家给的每个月9元钱的助学金，其中7.5元用于吃饭，1.5元用于买一些肥皂牙膏之类的日常用品。记得那天我是从学校所在的五道口坐车到平安里，然后从平安里步行走到天安门。虽然那段路很长，但是由于心情激动、愉快，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实现了自己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愿望。当时也没想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能够到首都北京来读书，很骄傲，很自豪。

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第一次进入大学校门的情景。当汽车开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写有“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的红色横幅，非常醒目，我当时就有了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想到自己也是建设时期游击队员的一分子，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一下子就充满了全身。

“地质工作者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这句话是刘少奇同志1957年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大学生时说的。这句话对我们这些学地质的人激励非常大，是非常荣耀的称号。而且我们进校后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为国家寻找宝藏，是非常光荣的。

那时我们的院长叫高元贵，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专家型院长，同学们都非常尊重他。温家宝同志曾在很多场合多次提到他。高元贵院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到学校后马列主义基础课是他亲自授课，高院长用很多形象的、有意思的比喻穿插在他所讲的理论中，还和大家开展讨论和辩论，同学们听得很有兴趣。高院长是一个非常民主的院长、教授，他当时说的一句话让我



终身难忘：“学问无止境，随时随地不忘学习！”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地质学院的校风非常好，每天早晨在晨曦的阳光下，校园里到处都是同学们看书的身影，学习的气氛很浓。当时校园很美，围墙上的一排排盛开的野蔷薇散发着淡淡的芳香，让人神清气爽。高元贵院长为北京地质学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我记得1992年40周年校庆时，他来参加庆祝会。当时他身体不太好，讲话声音都是嘶哑的。他讲完之后，台下掌声雷鸣般地响起，长达10分钟之久。这掌声里蕴含着大家对他的崇敬和深深感动。很遗憾的是，此后不久，1993年2月21日，高元贵院长去世了。



▲ 1999年4月28日，作者参加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国地质教育协会举办的高元贵办学思想研讨会

由于我来自浙江温州，普通话说得不好，年龄又小，也缺乏自信。所以，刚进学校时，我的性格并不开朗，因此也不爱说话，很腼腆。上学的第一年我几乎都没怎么说话，只是埋头读书。我认为，学习氛围对一个学生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我们那时都非常用功学习，头脑里没有别的想法，走到哪里，课本都不离手，平时一有时间就钻进教室或图书馆。那时的成绩实行5分制，我的主要科目每一学期都得5分。



在大学里，老师们教学的严谨精神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他们讲课都非常认真，我觉得听那些师长们的课很有味道，也让我对学习一直兴趣不减。我常说，大学教会了我做人，给了我知道，确立了我的人生观，这一点都不夸张。除了专业课，体育课也很有意思，冬天滑冰课，夏天游泳课。老师教导我们说，搞地质的人不仅要学好知识，而且要有健康的体魄，所以我们滑冰和游泳，这都是为了将来到野外工作进行的锻炼。因为在野外工作遇到雨雪是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在山里遇到山洪暴发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只有熟悉水性，才会在危急的时候有效地保护自己。可是我的体育不太好，滑冰上去就摔倒，需要人拉着我滑。游泳也是，我很怕水，根本不敢下水，直到毕业的时候才学会了游泳。有意思的是，我的大学毕业照片就是从游泳池刚出来后去照的，扎着小辫子，头发还有点湿。



20世纪60年代教育学生要爱祖国爱劳动，我们那时参加的业余劳动比较多，经常下乡去体验生活。我还是“访贫问苦文艺队”的成员，这也是非常锻炼人的活动。

◀ 1965年8月，作者的大学毕业照